

## 北宋古文运动发微

黄宝华

历史往往呈现出螺旋形上升的迂回曲折的发展轨迹。宋朝建立以后兴起的诗文革新运动似乎又回复到了唐代古文运动那一时期的格局,二者面临着同样的时代使命,即如何振兴业已衰微的儒学“道统”,同时革除颓靡侈丽的文风,恢复所谓“文统”。因而北宋早期那些倡导文学革新的健将同时又是复兴儒学的斗士。但是唐宋两朝的文学运动却有着不同的历史命运。唐代古文运动固然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但它并未以完全的胜利而告终,晚唐五代的文风仍趋于靡丽,古典散文也未能取代骈文的正宗地位。而承唐代古文运动绪余的这场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却未重蹈历史的覆辙,最终取得了胜利。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究竟何在,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历程?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 (一)

赵宋王朝是在唐末五代的长期混乱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这是一个王朝急遽更替、社会秩序崩溃、道德伦常解体的历史时期,官僚士大夫中不乏寡廉鲜耻、苟且偷生之徒,为争权夺利甚至至于有弑父弑君者。宋朝建立伊始就面临着加强中央集权、重整纲纪伦常的任务,因此继此衰世而生的一批社会精英就滋生出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意欲通过复兴儒学来整顿社会纲纪,为新王朝奠定道德伦常的基础,所谓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李觏、范仲淹等就是其代表人物,他们是蔚为大观的宋代新儒学的嚆矢。与此同时,他们又将晚唐五代以来文风的颓靡归咎于圣人之道之衰替与佛老之说的风行,因而文风的振起归根结蒂有赖于儒家之道的复兴。

为了实现这一儒学兼文学的双重复兴,他们重新抬出了韩愈这一尊偶像。他们之推尊韩愈,目的就是要恢复晚唐五代以来中断了的韩愈的传统,这个传统既是文学的,又是思想的,亦即文统与道统,因为韩愈在当时既倡言复兴儒家之道,又全力复振古文之体,他本人也标榜自己是集此二者于一身的人物,所谓“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宋初诸子对此有普遍的认同,正如柳开所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应责》)孙复亦称:“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信道堂记》)

正因为此,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就以发掘整理韩愈的文学遗产而揭开了它的序幕。韩集之由沉晦而复显于世,其首功当推柳开。据《张景集》中的《柳公行状》(今载《河东集》卷十六)称,柳开从天水老儒赵先生处受韩文,“一览不能舍,叹曰:‘唐有斯文哉!其馀不足观也。’因为文

章，直以韩为宗尚。时韩之道独行于公，遂名肩愈，字绍先。韩之道大行于今，自公始也。”可见他要肩负起韩愈的未竟之业，继承先祖柳宗元的坠绪遗志。其后穆修搜罗韩柳集，筹金镂版，亲自售书于大相国寺，更具有献身事业的热诚。此外如王禹偁、孙复、石介、范仲淹等也莫不以弘扬韩愈自任，努力使他的遗产重放光芒，以致形成了“学者非韩不学”的盛况（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

通过这场尊韩运动，他们重新确立了儒家正统的文道观，作为革新文学的理论纲领，并以道统和文统的继承者自居，大力鼓吹这一理论。宋初诸子打出的文道合一、文从于道的旗号比之唐代的古文家更为鲜明，首揭这一大纛的当推柳开，他明确指出：“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上王学士第三书》）矛头所向就是晚唐五代以来的那种华而不实的文风。王禹偁也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答张扶书》）孙复则称：“文者道之生也，道者教之本也。”（《答张洞书》）石介更以极大的热忱为尊韩重道而奔走呼号，对流行于时的西昆体作了猛烈抨击。他对文风之弊痛心疾首，感慨“四五十年来，斯文何屯蹇。雅正遂阙，浮薄竞相扇”（《寄明复、熙道》），而文之弊又根源于道之衰，因而他的《怪说》三篇上篇攻击佛老，中篇批判西昆，下篇合而言之，体现出文道合一的立场。在他看来，西昆体的“淫巧侈丽，浮华纂组”不单纯是文风问题，而是在于其离经叛道：“元始圣人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因而文学问题归根结蒂成了意识形态问题：圣人之道乃“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杨亿以淫巧浮伪之言破碎之”，所以二者要合而攻之。

宋初诸子这一系列的尊韩重道的举措，对晚唐五代以来的颓靡文风的确有摧陷廓清的作用，在重建文学的道德价值、强调文学的思想意义方面具有矫枉反正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他们的根本出发点在于重建儒家正统的权威，所谓“文”只是“道”的附庸，因而他们鼓吹的文道观反而又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甚至于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

这种文道观并未突破儒家传统的理论框架，究其渊源，实来自于儒家宗经复古与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其理论的核心可追溯到古老的“天人合一”观念。《周易大传》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的说法。所谓“天文”即指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等自然界的文彩，而人文则是指礼乐刑政、典章文物等社会上的文化。无论是自然之文还是人世之文，都是“道”的外化，这道在自然一面表现为天地运行、新陈代谢的法则规律，在社会一面则呈现为君臣父子、长幼尊卑的伦理秩序，而周孔之道就是对天地之道的集中概括、经典表述。作为人文之一的文学当然要以周孔之道作为自己的本质核心，这就必然导向文学上的宗经征圣，以儒家之经作为文学万世不易的典范，文学创作就是向这种楷模的复归。而文学的作用也就成了以儒家之道来“化成天下”，从而走向崇尚功用的文学教化论；缘情绮靡、吟咏风月等审美活动，藻饰文采、声律对偶等美感形式自然都成了排斥对象。这种理论在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那里已屡有表述，几成不易之论，北宋初期的古文家们正是重复了前辈的这些论调。

譬如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云：“观乎天，文章可见也；观乎圣人，文章可见也。……天之文章，日月星辰也；圣人之文章，诗、书、礼、乐也。”石介在《上蔡枢副书》中将天地万物描述为按儒家的伦理纲常组织起来的一个世界，而“文”就是它的外在形态：“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文之所由生也。”儒家经典则是“文”的典范：“三皇之书，言大道也，谓之《三坟》；五帝之书，言常道也，谓之《五典》；文之所由迹也。四始六义存乎《诗》，典谟诰

誓存乎《书》，安上治民存乎《礼》，移风易俗存乎《乐》，穷理尽性存乎《易》，惩恶劝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也。”于是文学也就仅仅归结为一种教化的手段，而当今之文则背弃了这一传统：“今夫文者，以风云为之体，花木为之象，辞华为之质，韵句为之教，声律为之本，雕镂为之饰，组绣为之美，浮浅为之容，华丹为之明，对偶为之纲，郑卫为之声，浮薄相扇，风流忘返，遗两仪、三纲、五常、九畴而为之文也，弃礼乐、孝悌、功业、教化、刑政、号令而为之文也。”不难看出，石介利用“文”这一词语的多义性进行了概念的偷换，以天地之文取代文学之文，进而否定文学内容的多样性与文学形式的诸要素，势必导向文学的取消主义，否定文学的审美价值和形式美的追求。

在实践中，由于他们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又往往形成一种高自称许、党同伐异的风气。他们总是将道统的传承系于某一位圣贤，而每每将自己视为存亡继绝的当代圣人。譬如柳开就曾说过：“自韩愈氏没，无人焉，今我之所以成章者，亦将绍复先师夫子之道也”（《答臧丙第一书》）；“圣人之道果在于我矣”（《答臧丙第二书》）。他还借他人之口标榜自己“升诸圣人之堂，将入乎室也”，“与先师夫子之文并而显之亦不废矣”，“子为宋之夫子矣”（《答臧丙第三书》）。石介那种当仁不让、攘斥异端的热狂尤过于前人，他一方面竭力推尊柳开、孙复，一方面用夸诞的言辞来表白自己卫道的热诚。如在《上孙先生书》中他以描写战争的笔法来展示这场斗争，他要与同志“被甲执锐，摧坚陈，破强敌……然后枭竖子辈首，致于麾下”，自己虽是“身不满三尺”、“举步趋跄”的木讷儒生，“于斯道也，身自视若八九尺长，方目广额，体被犀甲，头戴铁盔，前后驰十万骑，胆气雄烈，无所畏恐”，大有所向披靡之势。这种大言夸诞的作风往往使其议论失去分寸，显得强词夺理，从而产生负面的效应，遂为士论所不许。譬如他的《怪说》对杨亿丑诋太甚就是一例。时人称他“专以径直狂傲为务，人多畏其口”（田况《儒林公议》），“以怪诞诋訛为高，以流荡褻琐为黜，逾越规矩，或误后学”（张方平《贡院请诚励天下举人文章》，《乐全集》卷二十）。在庆历新政中，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词激烈，如斥夏竦与高若纳为“一妖一孽”，虽图一时口舌之快，于新政的施行反而不利，实为失策之举，故而范仲淹感叹此怪鬼辈坏事，孙复亦谓祸始于此。这种狂傲霸气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是有害的，它也危及到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使之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从柳开到石介的这批先驱者，与其说是思想家不如说是宣传家更为合适，他们在理论上缺乏建树，一味在文章中不厌其烦地罗列“道统”，提供不出多少新鲜的思想。在文学上，除王禹偁之外，也拿不出多少创作的实绩，作品一般都枯燥乏味。起而扭转这种风气的是以欧阳修为首的一批作家，继之而起的苏轼尤其其斐然的文学成就带动了一个作家群体，完成了这场文学革新运动。欧阳修尽管在尊韩卫道这一点上也继承了前辈的立场，对石介也推崇有加，但他并不偏废文学，而是在重道的前提下努力阐明文学的价值并积极从事创作，因而成为文坛的盟主，“文统”的真正继承者。欧石之间由此而出现分歧乃至论争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他们之间有过一次关于书法问题的论争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种分歧。

欧阳修发现石介的书法怪异而至于不可辨识，就致书予以婉转的批评。石介在答书中则抬出周孔之道为自己辩解，认为：“书乃六艺之一耳，善如钟、王、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图写而已，近乎执使以事上者，与夫皋陶前而伯禹后、周公左而召公右、谟明弼谐、坐而论道者，不亦远哉！”他自称“心能专正道，不敢跬步叛去圣人”，显然以后者自居，而艺术家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供统治者役使的奴仆，其贱视艺术的傲态溢于言表。欧阳修在信中向石介指出：身为学官，为人师表，反而标新立异，以怪诞为高，必将贻误后生，造成不良影响。石介则硬将书法字

学与圣人之道对立起来,声称“国家兴学校,置学官”不仅是教人以字,而是以“圣人之道”、“忠孝之道”、“仁义礼智信教人”,他标榜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于是一次普通的书法问题的讨论被提到了是非原则的高度,批评者反倒有了离经叛道之嫌。从这种强词夺理、文过饰非的言词中可以看出石介持论的偏激与独断。欧阳修称他“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实为中肯的批评。

欧、石间的这一论争表面上似乎只涉及书法问题,实际上体现了两人对艺术创作、审美追求的对立态度。宋初诸子重道轻文的观点被石介推至极诣,文学艺术本身的价值和规律受到了漠视;而在创作实践上,他们在反对华艳文风的同时又发展出僻涩险怪的文风,几乎葬送这场文学革新运动。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起而矫枉,才克服了这种不良倾向。

## (二)

宋初以来的古文走上险怪僻涩一途,可谓其来有自韩愈的理论与创作中已有追新求奇的一面,韩愈的后继者中,皇甫湜即走好尚异一路,这一派的余脉一直延续到孙樵。从古文家一面说,他们的用意主要在于对骈文的声韵诸婉反其道而行之,以显示高古不群,即皇甫湜所谓的“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矣”(《答李生第一书》)。当时裴度就已揭示出古文家的这一偏颇及其根源:“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以异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虽非于小人,亦异于君子矣。故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浅,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寄李翱书》)正由于中唐以来的古文走向这一条歧途,遂使晚唐以后骈文得以再度兴盛。

历史好象绕了一个弯子,到了宋代,古文家在反对骈丽文风的同时又重新偏向了这样一条创作道路。北宋古文运动是从批判流行的“时文”入手的。所谓“时文”即是流行于当时朝野间的骈文,它讲究声律对偶、词藻典故。古文家为了刻意矫枉就走向拗涩险怪,似乎非如此就不足以显示其古典。柳开在《应责》中指出:“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由此推想,当时的一些古文作者显然有“辞涩言苦”的倾向。张永在《答友生问文书》中揭示出两种偏向:“好古以戾,非文也;好今以荡,非文也。”所指即古文与骈文的两种不良倾向。然则为古文者往往走向怪戾,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王禹偁倡“易道易晓”说就是针对这种倾向而发的。他在《答张扶书》中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必不然矣。”接着以六经与韩文为例印证其观点。信中提到:“若第取其《书》之所谓‘吊由灵’、《易》之所谓‘朋合簪’者,模其语而谓之古,亦文之弊也。”说明当时的一此古文作者在“宗经”的旗下,往往通过生吞活剥地模拟经典而显示高古,遂使文章变得佶屈聱牙,张扶就是此类作者,诚如王禹偁所云:“今子之文则不然,凡三十篇,语皆迂而艰也,义皆昧而奥也。”(《再答张扶书》)这种风气,不仅存在于一般的作者中,即便是一些文坛的大家,其文风也多偏于僻涩。如柳开之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就称“其体艰涩”。南宋陈造云:“国初之文,五代萎靡之气未除也。士君子思革其弊,穆修、柳开倡为古文,天下仿之,往往用意过当,聱牙僻涩,至不可读”(《吴门芹宫策问二十一首》)。清代王士禛也称柳开、穆修“文皆疏拙”(《渔洋书籍跋尾·〈河南集〉跋》),柳开“文多拗拙”(《池北偶谈·谈艺》)。

正由于古文派的这种严重缺点,不能尽惬人意,故而骈文在西昆派的创作中再现了它的声势,可以说西昆体骈文的再盛,一个重要原因是古文家未能提供成功的创作典范。穆修曾经感慨“今世士子”追趋“章句声偶之辞”,而“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

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则指以为惑”（《答乔适书》），从中也反映出古文派时运不济的窘境。西昆派因而在宋真宗景德至大中祥符年间乘势而起，流风沿至仁宗朝，它的崛起离宋朝开国已有四十余年。一般的文学史在表述这段历史时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北宋建国伊始就流行西昆体的文风，于是石介等起而矫枉，振臂一呼，天下翕然风从，古文派终于击败骈文派。实际上北宋的文学革新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范仲淹在《尹师鲁〈河南集〉序》中写道：“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寔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的消长之势可以概见。无论对西昆派持何种态度，各派文人都不能不承认杨、刘诸人学问淹博、辞章功力深厚，宜乎其有耸动天下之势，甚至连石介也说：“杨亦学问通博，笔力宏壮，文字所出，后生莫不爱之。”（《祥符诏书记》）

早在《西昆酬唱集》问世之际，真宗就表示不满，并下诏戒浮艳之词。但西昆派风靡文坛四十年，石介在仁宗景祐初作《怪说》攻击西昆派，距其流行之始已近三十年。这期间古文作家的努力并未中断，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六载天圣六年擢陈从易、杨大雅知制诰，因二人在“文字以雕靡相尚”之时能“好古独行，无所阿附”。但是古文创作中好奇尚僻的倾向仍在继续发展，终于形成所谓“太学体”。

关于“太学体”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的文体，以前的认识并不很清楚，甚至认为它是属于骈文范畴的。如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称：“欧阳修所黜的‘太学体’疑也是模仿义山不成的末流之弊。”（第六篇、第一章、二）又同篇第三章之二将太学体归为时文一类，都是将它视为骈文之一体。其实太学体之形成与石介有很大的关系。仁宗庆历二年，石介被召为国子监直讲，当时正是庆历新政的前夕，石介与孙复等人力图振兴太学，为政治革新培养人材。他们为改变原来松散的教学制度，遂放宽入学人数，加强讲席的分量，实施新的听讲制度，于是学生增至数千人。同时他们利用自己的教席地位推行文风的复古，但也促成了以怪僻为宗的太学体的滋生。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载：“石守道介，庆历中主盟上庠，酷愤时文之弊，力振古道。”即指此。又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贡院请诚励天下举人文章》云：“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好尚，而遂成风，以怪诞诋訕为高，以流荡猥琐为贍。”这是证明太学体与石介有关，并为古文中之一体的直接证据。

起而纠正这种风气的是欧阳修。尽管他和石介有过亲密的交谊，对石介的业绩作出了崇高的评价，死后并作诗与墓志铭以纪念，但他对石介的称颂只是在卫道方面，而不是在文章方面。不仅如此，欧氏对石介的一些观点还提出了婉转的批评。如上文述及的关于书法问题的论争中，欧阳修在信中指出石介“好异以取高”的倾向，其实这也可以用来说明他的文学趣尚。在第二封信中，欧阳修针对石介的辩解作了进一步的论析，指出即使口称“行尧舜周孔之道”也不能以直为斜、以方为圆，这好比“纳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饭实酒匏而食”。石介称其“自异于众”，乃是因为佛老之徒器器、杨亿之流猖獗，故“天下为而独不为，天下不为而独为”。欧阳修指出这实际是将天下人看作一无是处，独有自己高明，故云：“夫释老，惑者之所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为。足下安知世无明诚质厚君子之不为乎？足下自以为异，是待天下无君子之与己同也。”这种标奇立异的思想正是他追求险怪文风的一个根源。待到欧阳修在嘉祐二年主贡举时，他终于藉助行政权力对这种文风进行了一次清算，这时距石介之死已十二年了。

据韩琦所撰欧阳修墓志铭，“嘉祐初权知贡举。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淡造理者，即预奏名。”又据欧阳发等所编《事迹》，“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

大坏(原注: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语;怪诞如‘周公评图,禹操畚鍤,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之说)。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间,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当时部分举子群起闹事,气焰颇盛,他们“同(欧阳)修出,聚谏于马首”(《四朝国史本传》),或“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当时名气很大的刘几是太学体的一位代表作者,此次也在被斥之列。沈括《梦溪笔谈》卷九称“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险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后来刘几改名刘焯(一作焯),变易文风,在嘉祐四年再试场屋,殿试时欧阳修为考校官,他的文章受到激赏,擢为状元,启封后方知作者姓名,时人叹服刘“能精敏于变也”(杨杰《无为集》卷十三《故刘之道状元墓志铭》)。此事反映出欧阳修扭转风气的决心与毅力,以及藉科举革新文风的巨大效果。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都是在此科登进士第,得人之盛,前所未有。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欧阳修的激赏,擢为第二。当时苏氏兄弟只是来自边远地区的无名后生,欧阳修将他们拔在高等,是顶住了很大的舆论压力的。(参见苏轼《谢南省主文启》:“是以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亦惟恃有执事之知。”)欧阳修不仅不为所动,而且以独具的慧眼认定苏轼足以充当其文学事业的继承人。他在读到苏轼的谢及第书后叹道:“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与梅圣俞》)后又亲嘱苏轼:“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苏轼还曾谈到:“昔欧阳文忠公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李廌《师友谈记》)显然欧阳修将主盟文坛的接力棒交给了苏轼。欧氏能积极奖掖后进,发掘培养人才,利用师友关系形成文学集团,这是他领导诗文革新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苏轼确能不负所望,薪火相传,终于蔚为大观。

嘉祐二年的这次进士考试确是扭转文风、使文学革新走上健康发展轨道的一个转折点,其意义不可低估。苏轼在及第后给欧阳修写的《谢南省主文启》不啻给北宋建国以来的文学发展历程作了一个概括,启中指出“自昔五代之馀,文教衰落,风俗靡靡”,皇帝下诏欲“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但“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馀风未殄,新弊复作……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启中称颂欧阳修“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之所待以觉悟学者”,正是对他革除积弊,并启新风尚的充分肯定。

纵观欧阳修对这场文学运动的论述,可以发现他在文学上并不以石介为宗,他在行文下笔时很有讲究,仔细揣摩其文,可琢磨出他心目中的传承和宗主。他在《记旧本韩文后》中推崇尹洙对古文的贡献,“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在《苏氏文集序》中又推崇苏舜钦:“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擗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在《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称:“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大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若谓近年古文自师鲁始,则范公祭文已言之矣。”而范仲淹的《祭尹洙文》则云:“天生师鲁,有益当世。为学之初,时文方丽。子师何人?独有古意。韩柳宗经,班马叙事。众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乃定,英俊乃随,圣朝之文,与唐等夷。子之功,多士所推。”又范仲淹有《尹师鲁(河南集集)序》,在肯定柳开首倡古文的前提下却高度推崇尹洙:“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

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其深有功于道欤!”欧、范的论述中都未提石介,这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表示了一种评价。通过这样的行文实际上对宋初以来的古文传统作出了抑扬取舍,体现出某种价值判断。在他们心目中,从柳开到石介的一批古文家虽有除旧布新之功,但由此而形成的怪僻文风实不足为训,因而受到了贬抑;而尹洙则成了重振古文的里程碑式的人物,苏舜钦也与有力焉,因而他们作为开风气的古文家而受到了高度的称颂,被描述为北宋古文的真正的奠基者。

尹洙之受推崇,一个重要方面是他的文风。欧阳修称:“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博学强记,通知今古,长于《春秋》”(《尹师鲁墓志铭》);“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论尹师鲁墓志》)。可见评价之高。欧文得力于尹洙为多。天圣九年欧阳修至西京洛阳充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同在西京留守钱惟演幕府,相与切磋诗文,渐以文章知名天下。据文莹《湘山野录》,钱惟演建成一馆,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修各撰一记,谢文五百字,欧文五百余字,独尹文止用三百八十馀字,“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欧阳修“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亦有类似记载,谓欧文先成,凡千馀言,师鲁仅用五百字,“及成,永叔服其简古。永叔自此始为古文。”这种简洁的文风对宋代古文主导风格的确立有重大意义,其“简而有法”甚至影响到清代桐城派的“义法”。

要之,经过欧阳修的努力终于形成一种平易畅达、自然委婉的文风,苏轼则进一步推衍发展,达到所谓“行云流水”的化境,欧阳修之后的北宋文坛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苏氏父子、王安石、司马光、曾巩等都以各具特色的创作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但不管他们的文风如何相异,它们都统一在流畅自然的总体风格之下,这就是宋文区别于唐文之所在。宋代所确立的这种新体散文成为后代散文家效法的主要楷模,衣被后世,功不可磨。就其传承而言,欧苏主要是继承了唐代李翱的传统,而摒弃了皇甫湜、孙樵的僻涩险怪,在当代则批判了宋初至石介的怪异作风(苏轼《谢南省主文启》指出这种作风实是唐代皇甫湜、孙樵传统的继续),注重对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的追求,因而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成就。其中对骈文的优秀成果的吸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它形成了宋文骈散结合、抑扬畅达的优美格调,这是需要另用专文讨论的一个课题。

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将北宋的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作了简单化的论述,把它归结为儒学复兴的产物、古文派对骈文派的胜利。这场斗争似乎集中表现为道学家对西昆派的批判,而欧苏则采取了同样的立场。本文通过勾稽排比史料,试图揭示这段历史的真相以及北宋文学革新的曲折历程,指出儒学复兴对文学革新既有促进也有阻遏的复杂情况,在其过程中既有古文派对骈文浮艳文风的批判,又有古文派内部纠正险怪文风的斗争,后者的意义绝不亚于前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后者,也就谈不上北宋文学革新的胜利,很可能导致重蹈唐代古文运动的覆辙。